

《南山集》案与方苞人生及心态的变化

张毓洲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康熙五十年发生的震惊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方氏家族遭受沉重打击。方苞因给《南山集》作序得罪,后经宽大处理,因祸得福,官运通达,由昔日家境贫困,又屡困场屋的落拓文士一跃而贵为天子侍从、本朝达官,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特殊的恩遇并未给他带来心绪的片刻宁静,反而使他陷入了心态失衡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一方面,他极力颂扬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善待自己并宽赦方氏族众的皇恩,另一方面,他没有完全挣脱《南山集》案的阴影,心绪凝重,心态极其复杂,如对作《南山集序》的追悔,对亡友戴名世的追念与痛悼,以及对方氏宗祸与自己家祸的无比痛心等。

关键词:《南山集》案;方苞;人生;心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022X(2010)06-0126-05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人称望溪先生,江南安庆府桐城县(今属安徽)人。桐城桂林方氏是该县的著姓望族,屡世宦宦,人才辈出,如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与学者方文和方以智均出身于桂林方氏,方苞也是该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后来他以古文创作的卓越成就及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成为桐城派初祖。不过,方苞的少年和中年时期历尽人间艰辛,备尝世间的愁滋味。

明末,朝纲不整,天下将乱。方苞曾祖象乾“以避寇乱,之秣陵(南京),遂定居焉”^{[1](P490)}。“自迁江宁(南京),业尽落”^{[1](P504)}。入清后,更是每况愈下,昔日显赫的宦宦之家日渐衰微。祖父方帜,岁贡生,担任过芜湖、兴化二县的训导、教谕之类的学官。父仲舒,仅为国子监生而已,未有官职,且“不治生产,而好交游”^{[1](P502)}。“江介耆旧过从无虚日,必具肴蔬,淹留竟日”^{[1](P494)},只管自己吟诗唱和,逍遥度日,全然不顾家境之萧然。其家中当时的窘况,方苞《弟椒涂墓志铭》有极生动形象的记述。如所言“贫无衣”、“候日就暄”、“旬月屡不再食”等情形,是家境窘困的真实写照;“家无僮仆”、“顾影自恐”则道

出了宦宦之家中落的寂寥和衰颓。这样,维持家庭生计的重担自然落在了少年方苞及其兄方舟身上,他俩轮流授徒他乡,不肯少歇。《兄百川墓志铭》说:“少长,即各奔走四方。余归,兄常在外;兄归,余常在外。”^{[1](P496)}同时,方苞的科举之路也不十分顺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他以岁试第一名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即考中秀才。此后,科场困顿,苦不堪言。三十二年、三十五年,两次参加顺天乡试皆名落孙山。尤其后一次,他心情抑郁,颓然南归,萌生了不复应科举之试,欲穷治诸经而另有所树立的念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念头很快被弃之脑后,功名之心仍强烈地促使他再次走上了应举的路途。三十八年,方苞又一次参加顺天乡试,终于荣登榜首,实现了人生旅途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但是,方苞的科举之路并非就此一帆风顺,紧接着三十九年、四十二年两次礼部举行的进士考试,他迭遭挫折。直到四十五年,再至京师,应试礼部,才中第四名进士。正当他如愿以偿,准备参加殿试时,母亲病危的意外消息忽然传来,方苞不听劝告,未等殿试举行,即匆匆南归探母,从而失去了殿试夺魁的大好时

收稿日期:2010-04-2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清代文字狱与文学研究”(09XJA751007)

作者简介:张毓洲(1982-),男,甘肃天水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机。苏惇元《方苞年谱》云：“屈殿试，朝论翕然，推为第一人，而先生闻母疾遽归，李文贞公（李光地）驰使留之不得。”^[2]（P873）“第二年，因为他父亲的病故，随后是戴名世《南山集》案的牵连，参加殿试的事也就长期搁置下来”^[3]（P300）。清朝的科举及选官制度规定，进士只有参加殿试，才能根据情况授予官职。方苞虽为进士，但未及殿试，不能谋得一官半职，仍是一介落魄文人。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挟嫌疏劾翰林院编修戴名世文集“语多狂悖”的《南山集》案爆发。《南山集》案是继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庄廷鑑《明史》案后，清代另一起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大案（此二案被史学家全祖望并称为“江浙两大狱”），它牵涉到江南桐城方、戴两大文化家族（故又被称作“桐城方、戴两家书案”），并累及朝臣二十多人。该文字狱案由戴名世《南山集》、《子遗录》而引发。《南山集》是戴名世的古文集，由戴氏门人尤云鹗出资刊刻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其中收录了一篇戴名世谈论南明史事的《与余生书》，使用了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王年号。《子遗录》是戴名世的历史著作，其中涉及南明君主时使用了不恰当的称谓。又因戴名世论南明史事的文字曾参阅过同乡前辈方孝标作的《滇黔纪闻》，所以已故多年的方孝标也被纳入该案首犯的行列。据此，清朝刑部认定方、戴二人立言狂悖，应处以“大逆”之罪，家属依律缘坐严惩。后来，康熙帝经过慎重考虑，宽大处理了本案。除严惩方、戴二家“首恶”外，家属或流放东北，或入旗为奴^[4]。方苞给《南山集》作序，又收存《南山集》、《子遗录》书板，加之是“逆书”《滇黔纪闻》作者方孝标的族孙，被康熙帝认为是“俱系恶乱之辈”的方氏族人，刑部也认定他犯了“诽谤朝廷”之罪，处绞立决。后来由于李光地的极力回护，兼之方苞古文声名早已远播，定案时，康熙帝特谕：“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1]（P515）因此，方苞被免处绞刑，入直南书房。此后，康熙帝的御制诗文的定稿，其他御制书籍的校勘，以及与群臣讨论本朝文学的状况，皆要征求方苞的意见。同时，方苞每年夏秋之际有随蹕热河的殊荣。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帝即位后，更加器重方苞。元年（1723），颁发恩诏，宽赦方苞全家入旗者归原籍，而方苞本人则扶摇直上，官运通达，于雍正一朝累官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朝，方苞仍官运通达，六年（1741），再入南书房，累擢礼部侍郎，为文颖馆、经史馆、三礼馆总裁。与此同时，方苞在朝廷中也享有一

定威望，“自诚亲王以下，皆呼之曰先生”^[5]（P304）。另外，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格外礼遇他，如方苞因年老患足疾，行走不便，雍正特“赐拄杖入朝”^[6]（P69）。但这种特殊的恩遇，并未给他带来心绪的宁静，反而使他陷入了心态失衡的矛盾和痛苦之中。

《南山集》案的发生，方苞死里逃生，因祸得福，实现了人生旅途的又一次重大转折。案后，他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昔日家境贫困、屡困场屋且自由涣散的落拓文士一跃而贵为天子侍从。他深知这一切都来源于皇恩的浩荡，感恩戴德之言不免溢于言表。《台拱冈墓碣》云：“吾父之歿也，宅兆未营，而不肖子以《南山集》牵连赴诏狱。会宗祸，有司奏宜族诛。圣祖仁皇帝哀矜，并免罪。”“且承圣制，谓以苞故而宥及全宗。”^[1]（P493）雍正即位后，方苞对康熙帝的宽大处理戴案和新帝雍正宽赦方族十分感激，《两朝圣恩恭纪》云：“始戴名世本案牵连人，罪有未减，而方族附尤从重。狱辞具于辛卯之冬，五上，五折本。逾二年癸巳春，章始下，蒙恩悉免罪，隶汉军。苞伏念狱辞奏当甚严，而圣祖矜疑，免诛殛，又免放流。臣身叨恩待，趋走内廷近十年，教诲奖掖，虽无过亲臣，蔑以加也。此圣祖之仁，所以如天，而皇上肆赦臣族，揆之圣祖迟疑矜恤之心，实相继承。顾臣何人，任此大德？自惟愚陋衰疾，欲效涓埃之报，其道靡由。”^[1]（P516）屈己扬人，伏低做小，感念之中时露戒惧之心。同时，方苞颂扬圣恩圣德，替清朝统治者粉饰太平，有时甚至到了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程度。在《圣训恭纪》中，当雍正再一次告诉方苞宽赦方族罪人是按照先皇的意志行事，并让方苞体谅其用心时，方苞极力奉承：“钦承训辞，虽古圣人之言，无以过也。”当雍正看到方苞年老，腿脚不灵便时，关切地安慰道：“朕观汝行步良难，虽供事，亦称汝力，毋自强，时复自将息。”方苞受宠若惊，感动加上激动，一时“伏地不能声”^[1]（P517）。方苞还想推己及人，让雍正的圣训德意能迅速播及其他人，达到影响和感化多数人的目的。如果说颂圣之言还兴许有点迫不得已、违心应酬之意的话，那么下面这句话则定为主动奉迎。乾隆九年（1744），77岁高龄的方苞作《书烈妇东鄂氏事略后》，称向慕满洲“兄弟姻亲，相依相恤，妇人勤女织，事舅姑，于古礼为近”的礼俗，接着举数例以证后，作评论说：“余尝谓本朝勃兴，众皆以为武威无敌于天下，自君子观之，则王业之本，受命之符，盖于是乎在矣。”^[1]（P130）方苞此言与后来雍正论辩清朝得天下之正时所说“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7]（P135）的论调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方苞已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身不由己、俯首贴耳、惟命是从的御用文人。他的这种处境与后来曾静、吕留良案中被赦免的曾静有些相似。曾静最后也拜倒在雍正脚下,在《大义觉迷录》和《归仁说》里,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忏悔,并按照雍正的“出奇料理”到各地巡游宣讲,现身说法以化导“愚民”。事不同而理同,方苞的《两朝圣恩恭纪》和《圣训恭纪》何尝不是自省和忏悔的表现。也许,这种对待罪犯的方式正是一种统治权术,在威胁恫吓下拉笼一些意志薄弱者替统治者吹嘘一番,而这些吹嘘之言是统治者自己想说却又难以启口的,目的是借此消解或缓和案犯家族及社会上其他公众的不满情绪和仇恨心理,以维系其统治。

颂圣不是方苞心态的全部,矛盾和痛苦的心境时时生发,挥之难去。

首先,对作《南山集序》的追悔之情。方苞在刑部的审讯中明明供道:“我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收板,罪该万死。”^{[8](P21)}而结案后,方苞一反常态,矢口否认自己曾为《南山集》作序,又一口咬定署己名的那篇《南山集序》,是戴名世代作。好友李塉的《甲午如京记事》载方苞之言曰:“田有(戴名世字)文不谨,予责之,后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9](P29)}李塉听说《南山集》案完结,方苞免祸,乃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即戴案后一年进京探视方苞,问及往事时,方苞如是说。这便给人留下了方苞《序》真伪问题的历史悬案。其实可以推想方苞当时的心情,蒙恩出狱,痛定思痛又喜极而悲,他不敢相信自己会从那场灭顶之灾的罪案中逃过一劫,也断然不会预料出狱后会沐浴到浩荡的皇恩。可这些难成之事偏偏都成为事实,他又哪敢公然承认不堪回首的往事,似乎一切都未曾发生。不过,方苞的那句话是他特定心境的忠实记录,暗含了他对作序的追悔之意。

关于李塉所记方苞之言是否可信,学者们有不同看法。大多数人认为不可信,《南山集序》即方苞所为。这种看法无可置疑。戴名世的供词即是证据:“汪灏、方苞、朱书、方正玉、王源的序是他们自己作的,刘岩不曾作序。”^{[8](P21)}又说门生尤云鹗的序是自己代作。这就很明确地说明方苞序是自作,而非代作。如果方苞不作序,年长方苞十五岁的戴氏也不会勉为其难。刘岩是戴氏好友,未作序,戴氏没有自行代作。何况方苞曾多次说过:“吾平生非久故相亲者,未尝加以文,惧言之不实也。”^{[10](P56)}由此可见,方苞给戴氏文集作序也在情理之中。虽然方

苞的那句“予序亦渠作”的话的内容不实,但此言不由衷之语出诸方苞之口也是不争的事实,非李塉捏造。因李塉《甲午如京记事》还记载方苞另一件旧事。方苞说:“苞居先兄丧,逾九月至西湖,募遇美姝,动念。先君逝,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期后,欲心时发,及被逮,则此心顿息矣。”^{[9](P29)}方苞是一个学行继程、朱之后的端谨学者,其文章及其它文字记录中绝少谈如上诸类事。更何况在难后,同情与抚慰才是必需的,调侃则与理不通。再推想一步,李、方二人从未交恶,方苞曾将李塉、刘捷、张自超、王源并称为“敦崇堂四友”^{[10](P65)},爱敬有加。以此作为旁证,足见李塉所记方苞之言属实,亦见戴名世《南山集》案的震荡使他的心灵更为矛盾而痛苦。另外,十余年后,方苞五十七岁所作《再至浮山记》一文,是承认悔作《南山集序》的真实心里记录,该文开头一段曰: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师数言白云、浮渡之胜,相期筑室课耕于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犹未归,独与宗六上人游。每天气澄清,步山下,岩影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华严寺门庑,望最高峰之出木末者,心融通神,莫可名状。将行,宗六谓余曰:“兹山之胜,吾身所历,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时,士女杂至,吾常闭特室,外键以避之。夫山而名,尚为游者所败坏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祸作,余牵连被逮,窃自恨曰:“是宗六所谓也。”^{[1](P423)}

其中对近名自恨的非同寻常的理解中委婉地包含着当年作序的事实。由此可见,从方苞对序的由不敢承认到承认的暧昧态度中,可以看出其悔恨又无奈的真实心境。

其次,对亡友戴名世的追念与痛悼。方苞与戴名世既是从表亲,又是“生同乡,志同趋”^{[10](P80)}的执友,甚或梦中亦不肯稍离,《与王昆绳书》曰:“梦中时时见兄与褐甫辈抵掌今故,酣嬉笑呼,觉而怛然,增离索之恨。”^{[1](P666)}同时,戴名世与方苞及其兄方舟皆过从甚密,时常切磋作文,且曾给方苞及其父、兄三人的诗文集作过序,如《方逸巢先生诗序》、《方百川稿序》、《方灵皋稿序》,另有《与方灵皋书》和《方舟传》等。这些特殊的关系将他们的命运紧裹在一起。

方苞虽受到康、雍、乾三代皇帝的殊遇,对《南山集序》的认可态度时有暧昧,但他对执友戴名世的追念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刘守安先生曾对方苞文集申述及《南山集》案的文字做过粗略统计,认为有60多篇,且大部分写于仕宦时期^{[11](P85)}。如常言“余以《南山集》被逮”,“以乡人戴名世文集牵连被逮”,

“《南山集》祸作”等。这些话反复出现,难免有些啰嗦,可在方苞看来不是不厌其烦,而是深有隐痛。日本学者佐藤一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做了深刻的剖析。他说:“通读方苞的文集,看到那极多涉及《南山集》事件的文章,也许会有人惊讶的。……这是他在叙述他生涯之中体验最深刻的事情。但是在那儿找不到戴名世的名字。然而可以认为,这些文章在纪念自己深刻体验的《南山集》事件的同时,也似乎有着纪念文字狱中倒下的亡友的言外之意。”[12](P175)《南山集》案让方苞终生无法淡忘,他反复写下上面的话语,无不暗寓自己失去了一位亲密执友。

同时,方苞对戴名世的追忆和痛悼还有其它比较隐蔽的方式。如《四君子传·序》说:“辛未游京师,得四人曰:宛平王昆绳、无锡刘言洁,青阳徐诒孙。”[1](P216)刘季高点校《方苞集》时于此处做了一个按语:“‘四人’应作‘三人’”[1](P216)。刘氏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因下文中实提三人,故“四”字无着落。但方苞有其精明过人之处,并非有意疏忽,此三人背后还暗藏着一位不便写出且又举足轻重的人:“桐城戴田有”或“桐城宋潜虚”。方苞辛未游京师时,见过戴名世并与之定交,确有其事。《方苞集·集外文·书时文稿岁寒章四义后》开篇即言:“忆辛未秋,余初至京师,偶思此题,成四义;言洁、潜虚、诒孙三君子深许之,遂定交。”[1](P634)其中潜虚即戴名世。以之与《四君子传·序》参照,可知方苞前文之“四人”中缺戴名世,是故意搁笔不书其名而虚位以待,亦可看到方苞不因戴氏被诛而中断思念。《余石民哀辞》写戴名世的门生余湛因二十年前老师给他的一封信而牵连被逮,对老师无怨言,在狱中仍“事戴(名世)礼甚恭”[1](P778)。其实是借写余湛而兼忆其师。《杨千木墓志铭》更是为戴氏之死鸣不平。戴名世由凌迟改处斩,刑罚减轻了,但罪名仍是“大逆”,可方苞仍直书“君,名世友也”[1](P740)。何况像戴名世那样的“大逆”之人竟有人为之收葬,在一定意义上,说明戴氏死非其罪。

方苞对戴名世的痛悼也偶有情不自禁的流露。康熙五十八年(1719),他看到十年前戴名世为其父仲舒所作《方逸巢先生传》时,睹物思人,说:“此亡友宋潜虚作也。”“亡友”二字含无尽伤感之意。最后对戴氏后继无人,书稿零落散佚的情形深表痛惜。他说:“潜虚死无子,其家人言:椁藏之文近尺许,淮阴某人持去。或曰尚存。或曰已失之矣!呜呼!是潜虚所自信为终不沉没者,其果然也邪?”[1](P633)同年,他作《送左未生南归序》云:“余每戒潜虚:当弃声

利,与未生归老浮山,而潜虚不能用,余甚恨之。”[1](P189)总之,每忆及惊心往事,方苞内心都会涌起波澜,且久久不能平静。

最后,方苞对自己宗族的不幸遭遇也深表痛心。其文章中屡言“宗祸”,宗祸当指戴名世《南山集》案所引起的方孝标《滇黔纪闻》案(一般将其粗略归入《南山集》案之中)。方氏《与赵仁圃书》记道:“延至康熙五十年,遭家震愆,以族人方孝标事,吏议亲族无己未服尽,皆当大辟。”[10](P40)这些是从总体上表述了宗祸的起源及惨烈程度。而《弟屋源墓志铭》则将宗祸具体化了。屋源,是方式济(1676—1717)的字。式济,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内阁中书,为顺治年间侍读学士方孝标之孙,康熙朝工部主事方登峰之子。康熙五十年因《南山集》案株连,随父遣戍黑龙江卜魁(今齐齐哈尔)。五十六年(1717),先其父卒于戍所。方苞《墓志铭》为式济卒后作。该文先忆说两家之友好交往;次叙式济童稚时与方苞之间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再述《南山集》案祸及方式济一家的情形。《南山集》案发后,宗祸降临,尽管从宽处理,但流放不可避免。式济不顾自身安危,“多方以脱族人”。当时人人惧罪,总是极力推托,“始部檄至三司会鞫,天属中有齟齬都水(方登峰)以求自脱者,并罄亡弟之罄”。面对此景,方苞和隶卒都痛心不已,“余目击骇痛,堂下隶卒皆心非而窃骂之”。文章最后交代了方式济一家遣戍后的悲惨遭遇:“都水尽室皆死于辽海,而弟亡于父母及妻之前。故闻其丧,亲暱朋好若疾疢在身,疏逝者亦怆然而不适。然弟身后,长子观永,次子观承以孤童勤营于内地,而匍匐万里以纪大父母、母、弟之衣食;此出彼入,岁相代以为常。”[1](P741—742)方苞通过对方式济生前一些琐事的回忆和其一家流戍后凄惨境况的描述,委婉含蓄地表露了同是方氏族人的他的幽怨和痛楚。

宗祸不仅给方氏宗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给方苞本人的心灵以重大挫折。难中,他惊惧而又惶恐地出嫁长女,喜庆气氛全无,伴随而来的是凄楚和悲怆。后来方苞给其长女写的传记中说:“余长女许嫁宋学士嵩南长子嗣葵,甫纳徵,余以《南山集序》牵连被逮,宗祸方兴,仓皇危难中,泣涕而归于宋氏。”[1](P227)同时他做了万分情急之下烧毁其父书稿这一令他抱憾终生的恨事,他在《跋先君子遗诗》中沉痛地说道:“苞之罪上通于天矣!”[1](P628)

同时,难后多年,他仍不时地回想起《南山集》案曾经带来的恐惧。《杜茶村先生墓碣》中“自先君子

歿，患難流離，今衰且老矣”^[1](P401)和《重建潤州鶴林寺記》中“又回憶平生悲憂危蹙”^[1](P433)兩處話語，皆隱喻《南山集》之禍。他在《教忠祠祭田條目序》中云：“安知尚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哉！”^[1](P92)劫後余生，暗自庆幸。我們可以據此窺知，方苞初入獄時的驚懼和生死難料的悲淒在時隔多年後隱痛猶存。其實，這種悲喜交織的複雜心情在當時的戴罪之人身上普遍存在。他們相信一旦獲罪，必將有九死而無一生，而當生的希望突然降臨時，一時又難以承受，恍如夢境，難以置信。

正因方苞的心態如此複雜，身為達官的他儘管上書皇帝或朝廷宰輔言說一些有關朝政得失或國計民生的大事，盡其職守，但是此時他的功名之心已甚為淡漠，在多數情況下，堅守斂迹藏形、不事張揚的心性。全祖望明銳地覺察到了方苞的此種微妙心理，其《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云：“公自謂宦情素絕，非有心於仕進，每得一推擢必固辭，而三朝之遭遇，實為殊絕，不得不求報稱，豈知勢有所不能也。”^[5](P305)我們知道，方苞的前半生熱衷功名，至於數困場屋，也不退縮，而當仕宦之機遇頻頻降臨時，未知驚喜，倍感“宦情素絕”，值遇升遷時，又固辭不前，錯失良機。這些不近常理的行為和心理，即近乎嚴迪昌先生曾說的“蔽風雨以養心自療”，“貌若閑逸實憤懣潛激”^[13](P106)，皆導源于曾經令他驚魂難定的《南山集》案。至於承受三朝恩典之殊遇，既是真心所願，又是出于情勢所迫而又勉為其難的無奈之舉。所以，頌聖感恩之喜與獄案陰影之憂并存，構成了方苞後大半生命運和心態失衡的二重性特征，也代表了清初士人順應清朝統治的心路歷程的轉變。方苞的“人生命運和情感經歷，是17世紀末18

世紀初中國士人心路歷程的簡寫和縮影”，“從戴名世到經歷了《南山集》案之後的方苞，體現了清初士人由狂悖不馴到斂性皈依的思想過程”^[14](P26)。

參考文獻：

- [1] 方苞. 方苞集[M]. 劉季高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2] 蘇惲元. 方苞年譜[A]. 方苞集[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 [3] 張捷夫. 清代人物傳稿: 上編第九卷[M]. 北京: 中華書局, 1995.
- [4] 張兵, 張毓洲. 清代文字獄的整體狀況與清人的載述[J]. 西北師大學報, 2008, (6). 張兵, 張毓洲. 清代文字獄研究述評[J]. 西北師大學報, 2010, (3). 張兵, 張毓洲. 《南山集》案與桐城方氏文化世族的衰落[J]. 西北師大學報, 2009, (4).
- [5] 全祖望. 鮑琦亭集[A]. 朱鑄禹. 全祖望集匯校集注[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6] 蕭爽. 永憲錄[M]. 朱南鏡點校. 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 [7] 胤禛. 大義覺迷錄[A]. 上海書店編. “大義覺迷錄”談[C]. 上海: 上海書店, 1999.
- [8] 張玉. 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J]. 歷史檔案, 2001, (2).
- [9] 李璉. 恕谷後集[A]. 續修四庫全書: 第1420冊[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 [10] 方苞. 方望溪遺集[M]. 徐天祥, 陳蕾點校. 合肥: 黃山書社, 1990.
- [11] 劉守安. 一個矛盾而痛苦的靈魂——方苞生平與思想探微[J]. 首都師範大學學報, 2005, (5).
- [12] [日] 佐藤一郎. 中國文章論[M]. 趙嘉善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13] 嚴迪昌. 往事惊心叫斷魂——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與乾、嘉之際廣陵文學集群[J]. 文學遺產, 2002, (4).
- [14] 關愛和. 《南山集》案與清代士人的心路歷程——以戴名世、方苞為例[J]. 史學月刊, 2003, (12).

責任編輯: 張玉璞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Case of Nanshan Collection and the Changes of Fang Bao's Life and Mind

Zhang Yuzho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Case of Nanshan Collection occurred in the 50th year under the reign of the Kangxi Emperor was the major literary inquisition case, which involved the Fang and Dai two literature families of Tongcheng and shocked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e Fang family suffered a heavy blow from the Case. Fang Bao was found guilty of writing the preface for Nanshan Collection and then was reduced the punishment so that he turned out to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and paved the way for his official career. After the Case, Fangbao's identity and status had changed much from poor literati to the dignitary, however, he was also overwhelmed with contradictory and painful state of his mind. This basically expressed the following two respects: first, he strongly praised the Qing emperors' kindness to be good to himself and to condone the Fang family; second, he was difficult to get rid of shadow, the state of his mind was more imposed him and impenetrably complex, such as regretting for writing the preface for Nanshan Collection, remembering and grieving over his deceased friend DAI Ming-shi and grieving for the disaster of the Fang family as well as his family.

Key words: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case of Nanshan Collection; Fang Bao; life; state of mind